

# 中国近代“国学”的“东学”渊源

史少博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6)

【内容摘要】中国近代学者一般把“日本学术”称谓“东学”。虽然中国古代早有“国学”之词,但是古代的“国学”一般指国家的贵族学校。然而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一般指本国传统固有的学术。在中国近代,一度出现了“国学”热,根据考证中国近代“国学”与“东学”有密切关系。其一,中国近代“国学”概念源于“东学”。据考证,中国近代“国学”概念借用了近代“日本学术”中的“国学”概念。其二,中国近代“国学”大师的思想深受“东学”影响。中国近代“国学”大师中,大多数国学大师思想都受到了近代日本学术的影响,即受了“东学”之影响。梁启超、康有为、王国维、章太炎、黄遵宪、刘师培等大多数中国近代国学大师,都数次东渡日本,其思想深深留有“东学”之烙印。其三,中国近代从“西学热”到“国学热”深受“东学”影响。由于中国近代“国学”大师受到日本近代“国粹派”思想的巨大刺激,思维方式从热衷于“西学”的对外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转向了潜心研究本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的“国学热”,并且力图从本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中华之精神,铸造东方中华之魂,以求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故而,不可回避地说,中国近代“国学”与“东学”有着深厚的渊源。

【关键词】中国近代“国学” “东学” 渊源

中图分类号:G122 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8)04-0091-05

DOI:10.16745/j.cnki.cn62-1110/c.2018.04.019

我国古代就有“国学”一词,例如《周礼·春官·乐师》中有:“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周礼·正义》有:“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可见,古代“国学”之概念是指国家所办的贵族学校。在我国,学界一般把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建国期间称为近代时期,研究我国的近代“国学”,也大体框定在这个时期。我国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学界也公认源自“日本”。日本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是指“一国之固有学术”。

“日本学者对中国学人的影响,不止于晚清即明治时期,大正乃至昭和时期,日本学术界对中国的影响一直持续,只是受到21条等影响,中国学人在普遍参考日本学术成果的情况下,回避提及所依据的出处,这很难用学术规范的概念加以评判。”<sup>[1][15]</sup>由于某种原因,我国近代学界一般把“日本学术”称谓“东学”,而回避了“日

本”二字。中国社会科学院耿云志研究员在《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序中写道:“在清末,学界曾较普遍地使用‘东学’一词来指称日本的思想学术。梁启超在许多文章中,也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东学’一词。因此,将当年梁氏本人指谓日本学术的词语,在研究当年梁氏思想的著作中加以采用,应当是可以为学界所接受的。”<sup>[2][12]</sup>例如梁启超曾经指出:“以求学之正格论之,必当于西而不于东,而急就之法,东固有未可厚非者矣。”<sup>[3][180-83]</sup>这里的“东”就是指日本。梁启超还指出:“使今之治东学者得以干前此治西学者之蛊,是又不幸中之幸也。东学之不如西学,夫人而知矣。何也?东之有学,无一不从西来也。……今我国士大夫学东文能读书者既渐多矣。”<sup>[4][182-83]</sup>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二》中的《东籍月旦》中多次提到“东学”,这里梁启超所说的“东学”就是指日本学术。日本学者宫村治雄著有《梁启超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近代的国学与东学关系探究”(项目编号:15XZX005)的阶段性成果。

\* 作者简介:史少博(1965—),女,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の西洋思想家论——その“東学”との關連において》(《梁启超的西洋思想家论——与“东学”的关联》),发表在1990年6月(日本)《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国—社会与文化》)第5号,其中的“东学”也狭指“日本学术”。南开大学任晓兰博士的论文《张之洞的东学观探析》中的“东学”也是指“日本学术”,其中指出:“‘东学’一词是清末学术界对日本思想和学术的较为普遍的称谓。”<sup>[5](P37)</sup>本文研究近代“国学”的“东学”渊源,故而借用了近代国学界常用的“东学”术语,而指代“日本学术”,那么研究中国近代“国学”的“东学”渊源,亦即研究中国近代“国学”与“日本学术”的渊源,下面具体分析。

### 一、中国近代“国学”概念源于“东学”

“国学”之概念,古代就有,例如《礼记·学记》有:“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其意思是国家设立的学校。而近代“国学”之涵义是“一个国家的固有之学术”,在不同的近代国学大师使用“国学”的涵义中,各有些差异,有认为“国学”即“国故学”,有认为“国学”即“国粹”,有认为“国学”即“国家固有的文化”。但总起来说,近代的“国学”概念是特指本国固有之学术。

中国近代“国学”概念源于“东学”,亦即中国近代“国学”概念借用了近代“日本学术”中的“国学”概念。中国近代国学大师频繁使用“国学”之概念,有学者考证关于近代“国学”概念的来源,一般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是黄遵宪在1887年的《日本国志》中介绍了日本的“国学”,多次出现了“国学”概念;一种说法是,梁启超与黄遵宪1902年商议创办《国学报》,近代意义上“国学”概念出现,还有一种说法是,吴汝纶等人东渡日本期间借鉴了日本“国学”的概念。根据以上各学者、专家考察近代意义上“国学”概念的来源,虽然各有执词,说法不一,但有共同的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国近代“国学”概念都与日本学术有关,可以说我国近代“国学”的概念渊源于“东学”,这一观点学者们都是认可的。因为黄遵宪、梁启超、吴汝纶等提到的“国学”都与他们多次去日本或研究日本“国学”有关系,提到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也都是在他们东渡日本之后。例如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

关注了日本近代的著名国学家本居宣长,提到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论述道:“先是,处士高山正之、蒲生秀实、本居宣长等,或著书游说,或倡言国学,皆潜有尊王意。”<sup>[6](P70)</sup>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还说:“近世有倡为国学之说者,则谓神代自有文字,自有真理,更借此伊吕波四十七字,以张皇幽渺,眩惑庸众焉。其字体如春蚓秋蛇,纷纭蟠结,不习者未易骤识。”<sup>[6](P808)</sup>可见,黄遵宪关注了日本近代的“国学”概念,并借鉴了日本的“国学”概念。又例如梁启超于1898年第一次东渡日本,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著作中,就多次提到了近代意义的“国学”概念。例如梁启超指出:“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sup>[7](P135-136)</sup>日本石川祯浩认为:“明治时期的日本获取了‘文明’的知识营养,并将其作为‘新知识’介绍到中国的,正是1898年戊戌政变后被迫流亡到日本的梁启超。”<sup>[8](P88)</sup>梁启超首次使用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可以肯定是在他流亡日本之后。吴汝纶曾经多次去日本考察了日本的教育与文化,吴汝纶于1902年农历的六月三十日的日记中有:“勿废经史百家之学,欧西诸国学堂必以国学为中坚。”<sup>[9](P796)</sup>吴汝纶使用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再次证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肯定地说借鉴了日本近代“国学”之概念。

### 二、中国近代“国学”大师的思想深受“东学”影响

中国近代“国学”大师中,大多数“国学”大师的思想都受了近代日本学术的影响,即受了“东学”之影响。梁启超、康有为、王国维、章太炎、黄遵宪、刘师培等大多数中国近代国学大师,都数次东渡日本,日本学者考证:“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四五年,中国翻译日本书一八九九种约是辛亥前的两倍,中国翻译日本书的倾向更加增强了,日本向中国流入文化更加明确了,这样的倾向是从来所没有的。”<sup>[10](P36)</sup>近代国学大师们,不但从日文翻译成中文的书籍中汲取了西方思想,更多地汲取了日本近代之思想。

梁启超在1899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后来回国后又数次东渡日本,日本近代的思想,比

较深刻地对梁启超的思想进行了全方位渗透,并且日本学者对西学的态度都影响着梁启超。梁启超了解西方近代的思想主要是通过日文资料。在日本,梁启超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孜孜不倦、废寝忘食地阅读了大量的日本学术文章,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考证:“明治时期的日本获取了‘文明’的知识营养,并将其作为‘新知识’介绍到中国的,正是1898年戊戌政变后被迫流亡到日本的梁启超。”<sup>[8](P88)</sup>日本学者福泽谕吉、中江兆民、中村正直等人的思想,给予了梁启超很大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耿云志研究员在《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著作中,还考证了日本学者高田早苗、加藤弘之、平田东助、平塚定二郎对梁启超思想的影响。梁启超还受到了日本近代“国学”的影响,对日本近代的“国学”进行了关注,逐渐深刻地意识到研究“国学”,必须关注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于是梁启超1919年提出了整理“国故”,并且于1923年为我国学者推荐、列举了诸多“国学”之书。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也流亡到了日本,后来又多次东渡日本,并且在日本阅读了大量的日文资料,当时日本的学术对康有为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例如日本的学者小林武考证:“中国近代的思想家,大体都是通过日本书籍吸收的西洋近代思想。例如康有为……花了大约十年的时间写了《日本变政考》,为此搜集的书籍一览是《日本书目志》(一八九六)……康有为列举参考的日本书籍,从哲学类来看有:末松兼澄的《哲学一斑》、井上円了的《哲学要领》、三宅雄次郎的《哲学娟滴》、中江笃介的《理学沿革史》、有贺长雄的《国家哲论》等等,列举了二二种;心理学类中有:元良勇次郎的《心理学》、井上円了的《通信教授心理学》、有贺长雄的讲述的《教育适用心理学》、井上哲次郎的《心理新说》收录了二五种。”<sup>[10](P33-36)</sup>可见,康有为在东渡日本期间,博览群书,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15卷,足以看出“日本学术”即“东学”对康有为的影响。日本近代“国粹主义”思潮也剧烈地冲击了康有为,于是他从关注日本学术到更加重视本国固有文化,提出保持“国粹”,“康于‘五四’激烈反传统与全盘西化思潮,早已洞见其发展势头及其危机。若国粹果然尽弃,则涉及‘国魂’之存

亡。……在他心目中孔教乃是中国政治、教化、风俗之本,乃是国粹之国粹。”<sup>[11](P115-116)</sup>可见,康有为的思想深受“东学”的影响。

1911年之后,王国维东渡到了日本,并且在日本生活了四年多,王国维最初在日本,也大量地阅读了通过日本翻译的西方著作,特别研究了康德与叔本华的思想。王国维曰:“日本备后三原城,有好古之士三:日川口国次郎,日久野元吉,日隅田吉卫。三君者,相得也,余皆得与之游。川口君之所居,有此君轩,久野君有墨妙亭,余皆记之矣。”<sup>[12](P169)</sup>王国维又曰:“同学山阴樊君炳清,译日本桑原鹭藏君之《东洋史要》既成,刊有日矣。吾师藤田学士乃论述此书之大旨……”<sup>[12](P29-30)</sup>王国维在日本结交甚广,广泛地汲取日本的文化,并时常与日本友人切磋。例如日本著名汉学家藤田丰八、内藤虎次郎、铃木虎雄等教授的思想对王国维思想影响很大。当然,王国维的“国学”,也深深受到了日本近代“国学”之影响,王国维等人在1911年创办了《国学丛刊》,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曰:“适同人将刊行《国学杂志》;……此志之刊,虽以中学为主。”<sup>[13](P3)</sup>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与梁启超等大师一起,推动了中国近代的“国学”的发展。

章太炎即章炳麟,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数次东渡日本,在日本翻译了岸本能武太等人的著作,根据日本小林武考证:“章炳麟读日本书,是他来日本为直接契机,他来日本三次。……章炳麟在日本期间接触了明治思潮,从日本书籍中吸取了大量的西洋近代思想。”<sup>[10](P45)</sup>章太炎从日本书籍中,接触了柏拉图、斯宾诺莎、康德等西方哲学家的思想,并且还对斯宾诺莎的“泛神论”进行了分析批判。例如日本小林武认为:“中江兆民翻译的《道德大原论》中,利他性的行为原论给予章炳麟很大的刺激。”<sup>[10](P86)</sup>章太炎受日本近代国学的影响,也从关注西学与日本学术,转向关注本国固有文化,并提倡彰显固有文化中的精神。章太炎虽然并没有认为“国学”的内涵就是“国故学”,但章太炎著有《国故论衡》,其内容涵盖了中国传统的各种学术,章太炎在此意义上的“国故”,可以说就是近代意义上的“国学”。章太炎经常为《国粹学报》撰稿,在《国粹学报》上发表多篇论文,“章太炎以全部精力

投入国粹研究。1906年9月,章太炎在日本创办了‘国学讲习会’。<sup>[14](P281)</sup>章太炎的思想中亦深深留有“东学”之烙印。

黄遵宪 1877 年到达日本,1878 年开始编纂《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目的是为了在日本文化与思想中,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日本学者小林武指出:“在中国产生了关于日本的专著,以黄遵宪《日本国志》四十卷(1887年)为代表。黄遵宪做为驻日公使馆参赞随何如璋来日,他用了八、九年的时间,完成了《日本国志》;……黄遵宪搜集了二百多种资料,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与时间完成了此书。”<sup>[10](P30-31)</sup>日本学者小林武还说:“黄遵宪于‘退食之暇,披览我载籍,咨询我故老,采风问俗,搜求逸事’。终于写成《日本杂事诗》二卷,《日本国志》四十卷五十万言。”<sup>[16](P15)</sup>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不仅介绍了日本的“国学”,还介绍了日本的国粹主义思潮。由此,黄遵宪在介绍日本近代思想的过程中,深受日本近代思想的影响。

刘师培携全家于 1907 年东渡日本,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亦吸引了刘师培德关注,幸德秋水等人的思想给予了刘师培很大影响。然而刘师培更关注的是日本的国粹主义思想。在日本明治 20 年代,国粹主义日本社会的主流思潮之一,有学者考证刘师培是最早借鉴日本“国粹”词汇的学者之一。“马丁·伯纳尔的《刘师培与国粹运动》一文,……它侧重探讨刘师培与国粹派的关联,……并提出刘氏某些思想的西方渊源及日本国粹思潮对中国国粹派形成的作用。”<sup>[16](P15)</sup>刘师培虽然一生比较短暂,但是留有世人的思想中,深深烙上了“东学”之影响的痕迹。

由上分析可知,近代国学大师们大多数东渡日本,不容质疑,其思想中都留有“东学”之烙印。中国近代的大多数国学大师的思想,比较深刻地受到了“东学”的影响。

### 三、中国近代从“西学热”到“国学热”深受“东学”影响

我国近代的学者称呼日本学术为“东学”,其实近代国学者大多关注的是日本近代的学术。而日本近代的学术内容主要包括:日本古代文学、神道、日本精神、国粹、日本国学、日本国体论等研

究,日本近代学者对西方文化的研究、对儒、佛的研究,也包括在日本学术之内。特别是日本从明治时期开始,就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日本政府全面实行西化,颁布并实施了“脱亚入欧”政策,于是在日本掀起了一场文明开化运动,日本传统文化在近代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一度狂热的欧化风潮席卷了日本。日本的一部分学者,为了对抗在日本全盘欧化,主张重视日本固有的文化,阐发日本的固有精神。由此,日本掀起了国粹主义思潮,三宅雪岭、志贺重昂、井上圆了等人是日本国粹派的主要代表,他们主张“国粹保存”,对抗日本的盲目全盘欧化,成立了政教会,以《日本人》杂志为宣传阵地,讴歌、赞扬日本的固有文化,反对西化。三宅雪岭著有《真善美日本人》被称为日本“国粹主义”的代表作。

我国近代东渡日本的国学大师们,开始主要是通过日本翻译西方的书籍了解西方近代思想,并且大量汲取了西方的思想,继而又受到日本国粹主义思潮的影响,研究方式也与日本近代学者们的研究方式一样,从热衷于西学回归到对本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出现了近代的“国学热”。由于中国近代“国学”大师受到日本国粹派的巨大影响,近代国学大师们从对外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转向了关注本国文化,特别是转向了关注本国的传统优秀文化“国粹”,于是中国近代国学大师们纷纷回国,创立各类国学会,创办各种宣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报刊,1902年,黄遵宪就与梁启超商议创办《国学报》之事。1905年,邓实担任的“国学保存会”创办了《国粹学报》会刊,1905年在《国粹学报叙》中黄节这样描述:“昔者日本维新,规藩覆幕,举国风靡,于时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三宅雄次郎、志贺重昂等撰杂志,倡国粹保全,而日本主义卒以成立。呜呼,学界之关系于国界也如是哉!”<sup>[17]</sup>1905年,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规定了《国粹学报》为“国学保存会”的机关刊物。1907年,邓实等人继而创办了《国粹丛编》期刊。刘师培在日本,受到了日本“国粹”思潮的很大影响,1908年刘师培从日本回国,成立了四川国学会,积极推动了我国的保持国粹的运动,在《国粹学报》发表了诸多文章。1919年,刘师培等人成立

了“国故月刊社”北京大学创办《国故学刊》。我国近代学者深受日本近代国粹主义思潮的刺激,受到日本“国粹派”思维方式的影响,在中国近代随之也出现了“国粹派”及国粹主义思潮,主张关注国学。章太炎的《国故论衡》,从关注西方文化及日本学术,回归到潜心研究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王国维也通过日本了解了西方思想之后,思维方式从关注西方转到关注本国文化,1919年开始,我国各地的大学,纷纷地建立了国学研究院。例如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大学开设国学课程,梁启超、王国维等著名教授都曾给学生讲授“国学”。中国近代的国学大师们,潜心研究我国的固有文化,从我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中华之精神,铸造东方中华之魂,以求使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例如梁启超,“他编纂了《中国魂》,力图发扬中国人的国民精神和爱国思想,三年后进而刊行《中国之武士道》,致力于弥补精神教育的缺点,唤醒中国魂。”<sup>[8](P75)</sup>可以看出,近代国学大师们的思维转向,是受了日本近代学术中“国粹派”思想的巨大影响,思维方式随之发生了转向,不可避免地说:中国近代“国学”与“东学”有着深厚的渊源。

总之,中国近代有志之士,从对外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到从本国固有文化中挖掘救国救民之精神,致使中国近代从“西学热”转向“国学热”,出现了研究“国学”的诸多专著与论文,这与国学大师们在日本受“东学”影响密不可分。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近代国学者的某些理论,被日本法西斯主义者所利用,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这一点是被我国近代国学大师们所厌恶与批判的。

参考文献:

- [1]桑兵,张凯等编.近代中国学术批评[M].北京:中华书局,2008.
- [2]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 [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四[M].中华书局,1989.
- [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二册[M].中华书局,2015.
- [5]任晓兰.张之洞的东学观探析[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09(6).
- [6]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三十二,学术志二[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 [7]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8][日]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 [9]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A].近代中国史料丛刊37辑[C].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796.
- [10][日]小林武.章炳麟と明治思潮[M].东京:研文出版,2006.
- [11]汪荣祖.康有为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2]王国维著.文明国编.王国维自述[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
- [13]王国维.王国维讲国学[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
- [14]华强.章太炎大传[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 [15]郑海麟.黄遵宪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6]李帆,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清学史著述之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17]黄节.国粹学报叙[Z].国粹学报,1905(1).

(责任编辑:丁芳琴)